

回望,为了更好的前行

□滕贞甫

庚子开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如同炼狱之火疯狂肆虐,又如一个隐身的幽灵在城市乡村、厂矿田间游荡,迷雾罩江汉,愁云笼九州。这场炼狱之火,燎去了杨柳岸的晓风残月,燎去了销金窝的轻歌曼舞,燎去了某些人贴牌的华丽外衣,将原本遮掩的羞处裸示于人。

面对炼狱之火,在感恩那些心怀大爱的救火者、点赞那些义无反顾的蹈火者的同时,我们是否要思考,不能因为有人扛雷负重,就对自己的轻松心安理得,也不能因为岁月静好,就对造化的诡谲盲目自信。思考是对来路的回望,人类走到今天,是一个不断回望的过程,孔圣人能每日“三省吾身”,我等凡夫俗子坐到十年一回首应该不难。

大战当前,需要直面,奋勇厮杀,也需要回望来路,斗智斗勇。回望是为了趋利避害,也是为了更好的选择战略战术,那么,在拿捏选择这个关键词时,当做哪些选择呢?

对此,有人选择了对荷且者的批判,有人选择了对愚蠢者的谩骂,有人选择了对不幸者的祈祷,还有人选择了对火场逆行者的讴歌,等等。

我理解大多数人的选择,我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权力。当然,社会和百姓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自作聪明的马后炮。

面对炼狱之火,如果你不在一线灭火,如果你有一定的时间,不妨回望一下来路。澳洲正在燃烧的森林大火,数以亿计的野生动物命丧其中,当看到电视上那些萌萌的考拉被烧得面目全非,看到憨憨的袋鼠端坐炭化,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些被烧死的袋鼠离无火的戈壁并不远,它们原本是通过戈壁的草场进入森林,结果因为不记得来路,东突西奔,在不知所措中被火焰吞去了生命,而它们离回到草场的路近在咫尺。记得小时候,我居住的村子东面有个榆柳丛生、杂草疯长的乱葬岗,我要去读的那所中学恰恰需要穿过这片坟场。每次放学经过坟场,那种鬼火晃晃的恐怖感令我每根头发都要竖起来,蒙童时期听过的鬼怪故事一幕幕浮现眼前。有人说走坟场万万不可回头,一定要大胆往前走,我将此话当成宝典,经过那里时总是加快脚步。但是,走在坟家之间我经常会感觉到身后有沙沙声响,我快它快,我慢它慢,穷追不舍跟着我,让我惊悚万分。人到惊恐极致会绝地反击,就像吓死前会拼上性命大吼一声,当我被追得心悸腿软时,干脆就止住脚步、双手握拳回望一下身后到底跟着什么,我想,假如真有厉鬼害我,至少在被害前我要看清厉鬼的模样,否则岂不是稀里糊涂成了冤魂。我明明听到有跟随的沙铃声,回望时却只见朗朗月光,每次都这样走走停停穿过了那片坟场,从那时起,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回望,可以蔑视恐惧。

面对炼狱之火,我觉得不妨回望一下来路。回望什么呢?当然不是回望风景,更不是

回望荣光,要回望的是厉鬼的模样,受戕害的生命和被忘却的疤痕。

厉鬼曾经真实地出现过,在17年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为了防控非典型疫情扩散而严管的京城,马路上空旷无人,街两旁店铺紧闭,中学时走夜路的恐怖

仿若又出现在我的身后。当时有很多人逃离北京,因为北京是疫区,也有很多人赴汤蹈火,因为北京是战场,名不见经传的小汤山一夜成名,年过花甲的钟南山临危受命。这一切,回望中本应该清晰如鉴,然而仅仅过去17年,那一幕已被淡忘。一位伟人说得对,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遗忘者背叛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与死神较量的英雄,是血和泪写就的教训!我们只顾往前走,不愿回头看,因为前面是幸福的憧憬,是甜美的梦想,而回望却往往是痛苦的反复。而人要想不重蹈覆辙,经常回望是最好的选择,不要图走得多么快,关键要走得多么稳,一次马失前蹄,足可以让你跌回原点。

戕害生命的行为时时都在发生。华南海鲜市场不足为奇,我在很多城市见过类似的交易场所。口舌之欲,肆无忌惮是我们这个自称舌尖上的国度应该革弊鼎新的陋俗。恩格斯说,是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这是文明;今天,炼狱之火又把人和动物勾连起来,这便是野蛮了。当炼狱之火燃起的时候,有人怪罪于果子狸、蝙蝠、竹鼠和穿山甲,要知道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从来就没有与人敌过,不仅如此,这所谓的四大替罪羊要比人类存在的更早啊,人家才是地球村的土著。我们的先哲为了让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创造了诸多神话,制定了诸多戒律,甚至许下了诸多因果,目的就是让人们对其他生命存一点恻隐之心,慎杀、少杀、不杀它们,这些理念是人类最初生存经验的结晶。不得不承认,我们从来缺少真理,我们缺少的是对真理的回望,缺少的是对圣人之言的敬畏。

疤痕,也许对于战斗者是勋章,对于懦弱者是耻辱,对于经历过坎坷的人来说则是苦难的路标。路标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丈量距离,它更是回望来路的参照,它让人的回望不至于被海市蜃楼所置换,不至于被霓虹烟霞所虚化。疤痕在,痛点不会麻木;疤痕被



天使弘毅(布面油画) 陆琦作

美图,溃瘍就变成了内伤。对疤痕的回望是不幸记忆的回放,尽管痛苦,但能避免伤疤复制,那些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不仅可怜甚至有些可恨,为这些不长记性者疗伤,已经消耗了太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原本是其有限的。

面对炼狱之火,我们在回望来路中擦亮历史的罗盘,找出今日的坐标。

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发生在1910年冬天东北的那场大瘟疫。上书朝廷封闭山海关,挑战民俗底线焚烧疫尸,不迷信法国专家坚持飞沫传播观点,这些都出自伍连德医生的担当。年纪轻轻的伍连德在半年时间内率领他的团队控制住疫情,拯救了千千万万华夏儿女,这是无法超越的功德。依当时中国的卫生条件,一旦鼠疫入关并在中原大地蔓延,将无疑是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惨剧在亚洲的重演。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当然会明白,疫情汹汹,须放下妇人之仁;人命关天,要不计功利;生死考验,当牢记誓言承诺。

回望来路,当然还要放眼征程,回望是精神的自省,是磨难的砥砺,而不是萎靡、颓废和无所作为。当我看到机场、车站一排排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江汉疫区的医务工作者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那些队伍中很多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用义无反顾的出发告诉人们,新的来路,必定由他们踏出!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总是与各种既定的标签捆绑,使得“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深陷于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泥沼中,逐渐显现出被尘封的“孤岛”感。实际上,“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虽然表现形式特殊,但它们均是根植中国文化的土壤,描绘中国人物、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砥砺奋进精神的作品。此外,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十七年”的中国科幻更加全面且精准地预言了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

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这种对科技,尤其是对科技发明的向往之情极其强烈。当然,这种向往并没有走向魔法化或者像古典技术幻想般缺乏自治逻辑,转而是通过构建科技乌托邦的形式,去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的最终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吃饱穿暖、城市化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充满科技化元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风靡全国,这部小说实质上是一部游历性的发明创造小说,多年过去,读者仍对其中小汽车大小的西瓜和足球大的番茄记忆犹新。对巨大、巨量农产品的描述其实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中已有体现。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徘徊,吃饱穿暖成为了最为迫切的诉求,因此借助科技力量达成未来粮油不愁的美好生活是当时科幻小小说白胖胖的内容之一。1956年,迟叔昌发表科幻作品《割掉鼻子的大象》,故事讲述“我”受邀到位于戈壁的国营农场进行丰收新闻的采访,却意外地遇见了人们在追逐观看一群没有鼻子的白白胖胖的大象,“我”带着各种疑问最终见到了国营农场的老同学李文建,他为我解释这是国营农场的新型农产品“白猪72号”,并带我参观了国营农场的其他奇迹,还让我品尝了新品种猪肉做成的美味菜肴。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部分读者甚至认为迟叔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大跃进时期“肥猪赛大象”的状况。尽管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违背了生产规律,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期待是对丰饶物质生活的向往。除《割掉鼻子的大象》外,“十七年”时期类似的小说还有鲁克在1960年发表的小说《海底鱼厂》、王国忠在1961年发表的《海洋渔场》等作品。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除养殖业外,种植业也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小说中得到了想象

“十七年”科幻:从幻想到现实的中国速度

□肖汉

性的表达。1963年,鲁克的小说《鸡蛋般大小的谷粒》问世,顾名思义,作者通过构想中的农业科技,让谷物单粒成长迅速且巨大,然后快速地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同样,在萧建亨1962年的科幻作品《蔬菜工厂》中,未来中国的农作物种植,完全形成了自动化、快速化的产业链条模式。1963年,王国忠的科幻小说《春天的药水》发表,又从农药与催化剂的角度切入对未来中国种植业进行了构想。上述种种关于农业的科幻小说现在看来可能略显平庸,但是如果回归彼时语境,这已经是十分超前的想象力表达了。当前读者之所以认为“十七年”时期这类科幻略显幼稚,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经验环境相较于70年前已经大相径庭。追求全面小康生活的当代国人较难理解为何彼时作者要描绘体型硕大的作物,而以袁隆平院士为技术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以科技强国的路径达成了对“鸡蛋般大小的谷粒”的拟换。因此,并非“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幼稚,而是70年来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让幻想得以介入现实。

中国古有四大发明,今有新四大发明——高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与网购,这些在我们当代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在过去还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存在。1957年,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问世,畅想了20多年后国民便提出行的种种场景。得益于中国高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文字中的浪漫主义,而每天经历朝夕至的当代国人也很难想象即便在30年前50公里山路都需要驱车大半天的时光。因为中国速度,幻想正不断地变成现实。在《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中,迟叔昌还想象出电动汽车与交通工具上的互动机器人,并认为这些都是难以企及的未来科技。反观当下,新能源汽车最近几年已经成为国家绿色发展与环境友好举措的新方向,充电站、充电桩随处可见。而遍布商场、高铁

站与机场的互动智能机器人正与全息投影导航和VR设备相映成趣。这些在“十七年”科幻小说中处于想象力彼端的科技神话,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国人的生活日常。

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对智能手机某些功能的描绘。严远闻于1958年发表了《假日的奇遇》,其中开篇就描绘了主人公新到乐乐家过暑假前打可视电话的场景。在严远闻当时的想象中,可视电话是一种大型的放在玻璃罩中的装置,使用该装置需要一定的准备与流程。而今,视频通话成为了当代国人即时交流的必备技能,并且操作方便简单,实时直播已经从个体行为变成了风靡全国的文化产业。出门三件套也从钱包、钥匙、公交卡简化为“只要有电,便捷永不离线”。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与田汉语剧同名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在最后的半个多小时中,构建了社会主义未来生活的种种情形,其中包括蔬果繁茂、畜牧兴旺、人们载歌载舞、有声信件、可通话电视、乘火箭去太空等内容,这些场景透过黑白画面传达出属于那个年代的张力。而今,在我们的艺术表达中,上述场景并不常见,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将多年前的想象变成了日常,一切的快捷舒适,都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当然,除农林牧渔与日常生活外,“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也关注重工业以及大型重器的制造。受20世纪中叶太空热,尤其是苏联太空探索的影响,“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有很多将目光投射于太空。新中国科幻巨擘郑文光发表于1954年的《从地球到火星》以及之后发表于1957年,斩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的《火星建设者》都将火星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中国人民的太空探索精神,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掀起了火星观测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对月球的好奇与向往也非常强烈,无论是早在1950年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1年薛殿会的《宇宙

旅行》中,还是在1955年郑文光的《征服月球的人们》、1956年鲁克的《到月亮上去》中,月球上的神秘景象与神奇的物理现象都被科幻作家们化作文字跃然纸上,满足了读者对陌生化世界的美学期待。

除自然天体外,人造天体也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作家热衷描述的对象,尤其是人造空间站。1954年11月,郑文光在《中国青年报》上于23至30日陆续连载故事《第二个月亮》,该小说后于1955年收录在文集《太阳历险记》中。一年之后,于止(叶至善)也出版了单行本科科幻小说《到人造月亮去》。两个故事都以人造空间站为背景进行描写,并且在小说中插入了详尽的空间站剖面图,让读者对这一航天器有了较为透彻地了解。此外,“十七年”时期还有部分作家创造性地写出了天气控制类科幻小说。1956年底,梁仁黎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小说《呼风唤雨的人们》,是“十七年”时期较早涉足人工天气控制的科幻小说。1962年,刘兴诗《北方的云》将这一类科幻推向顶峰,小说的叙事大气磅礴,讲述了气象控制站的科学家如何蒸馏并运送渤海海水,以解决内蒙古农业试验站干旱的燃眉之急。

上述“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想象天马行空,场景恢弘,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徜徉思绪的空间。而今,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大范围天气控制技术尚待开发,但小范围天气调节技术与小空间环境改变技术已日渐成熟;伴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力的加强,天宫空间站也拟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并投入使用;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嫦娥”探月工程,历经15年探索,国家航天局表示于2019年年底前后发射“嫦娥五号”探月卫星,“玉兔号”月球车也已在月面完成了972天的探索工作;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已经公布,火星探测器已于2019年10月首次公开亮相,并计划于2020年发射,在2021年之前登陆火星。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已近在咫尺。中国的科幻传统除关注器物层面外,还关注

个体与群体的精神状态,“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十七年”时期的部分中国科幻小说语言通俗化、呈现形态稚嫩化、主人公多设定为少年儿童、预期读者也是少年儿童,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文学价值降低的表现。实际上,这种现象却反映出中国科幻独特的中国性,即专属于中国的未来观。西方科幻,甚至于苏联、日本科幻,它们的未来观是纯粹的线性时间,未来即是时间的远端。而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未来观是循环可复制的,它的落脚点是人,伴随不同个体的成长,青少年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经验最终会共同构成中国的未来观。当然,以回环可重复的成长经验所塑造的未来观除了指向远端,还能勾连历史,从而引导我们当前的国家建设,譬如千年大计雄安新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都是这种落脚到人的未来观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

“十七年”时期的部分科幻小说同样展示了我们的大国担当与民族认同感。王国忠于1963年发表的科幻小说《黑龙号失踪》,通过一个混合军事、历史与悬疑风格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对和平的热爱与对帝国主义的抨击。又例如童恩正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中,通过一个三线叙议的历史考古故事,揭露了一段资本主义的阴谋,还原了一段古埃及人的迁徙史,还批判了西方本位主义并自信地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起源。这篇小说在当时激起了读者极强的民族认同感,还有很多年轻人立志以后要从事考古相关的工作。上述种种,均是“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所传达的正能量精神。

中国速度让幻想介入现实的时长变短,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日常和可期的近未来,确实难以被冠以科幻之名,但在回溯的目光中,当今生活已经被“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全面且精准地预言。当下的中国科幻正在极力挣脱西方科幻传统的束缚,并且尝试讨论宇宙、人类以及思维的终极,未来的读者与批评者同样也会认为我们当前所写的文字略显拙劣幼稚,但也会感叹于我们对未来事物所做的精确预言。因此,科幻小说的萌芽、发展、壮大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密不可分,而科幻小说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则是一个螺旋深入、不断追求究极而渐次展开的过程。

抗击疫情与文学创作

□陈玉福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从武汉引发并迅速蔓延开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广大文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面对疫情带来的灾难,以文学为武器吹响了时代的号角,展示了灾难来临时期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用文学展示社会风尚,记录时代风云,弘扬时代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我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忠君爱国、心忧天下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怀,站在时代的前沿,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抱负。尤其是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知识分子总是用手中的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在现实中激发灵感,分享成功的感动,记录生命的美好,引领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创作出了激荡心灵,无愧于历史的优秀篇章。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矛盾斗争和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不断获得智慧和力量,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灾难文学”。曹操有感于战争离乱,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千古名句;杜甫遭安史之乱,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李煜从皇帝到臣虏,“旦夕以泪洗面”,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灾难的发生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客观的生活基础,为“灾难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本底色,在与灾难的搏斗中人类发挥才智,彰显品格,获得了不屈不挠地战胜灾难的勇气和力量,作家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颂扬灾难面前逆行者的牺牲精神、时代精神和大爱无疆的英雄主义情怀。

“灾难文学”是灾难与作家心灵耦合的产物,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渲染灾难,而是要张扬在抗击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国家精神和人文关怀;“灾难文学”要挖掘灾难背后的客观因素,寻找避免灾难的正确途径,提供人类反思的可能空间;“灾难文学”要表现人类的悲悯情怀,解救受难群体的肉体 and 灵魂;“灾难文学”要昭示社会的关注,弘扬科学的力量和对自然的敬畏,为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精神平台。

文学创作要切近现实,切近生活,疫情防控就是现实,就是生活,疫情防控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工作者必须扎根现实,扎根生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和创作导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疫情防控期间,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策,安排部署,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严防死守,车站路口党员干部登记信息测试体温,所有社区设立党员岗安排值班,随时掌握出入人员,及时安排居家隔离,为阻断疫情传播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政府的这些举措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激发了广大文学工作者极大的创作热情,大批优秀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以西部文艺家为例,吴德文先生任金昌市老年曲艺团团长,擅长曲艺创作和表演,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他亲眼目睹了金昌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精神,组织各部门各单位人员日夜防控,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举措和行动,他情之所系发诸笔端,写成极富西部语言文化特色的快板作品《誓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并录制成音频,可谓文采华章,声情并茂,以“快板”这种独特的方式,自编自演,传递党的关怀、爱的召唤:“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的危难挂心间”,字里行间温暖温暖:“全国上下齐动员”,“一级一级抓落实”,真情实感真实写照;“金昌市抓得紧,领导重视措施狠”,干群同心,严防死守;“白衣天使冲在前,把人民生命扛在肩”,赞美白衣天使,呼唤血肉亲情;“最危险的地方是党员,誓与死神抢时间”,展现党员风范,践行以自己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布下天罗和地网,冠状病毒无处藏”,表现抗击疫情众志成城的坚强决心;“医务人员保平安,全国人民更健康”,表达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信念,可谓字字蕴含真情,句句发自肺腑,以如椽之笔抒发了对防控疫情的赞美和全国人民心系患者的深情厚谊,仿佛远古的驼铃,又像铿锵的誓言,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甘肃武威作家尚登英的《窗外的喇叭声》语言清晰,朴实无华,作者以纪实的笔法,记录了自己从外地回来居家隔离的情景,每天都有“一位短头发很担当的女干部手里拿着大喇叭不时地喊……”天天如此,看似简单的行动,实则表现了社区干部为了防控疫情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and 热情,“门口始终有一群人在尽职尽责地守护家园”,苦口婆心要求住户戴口罩,居家隔离,每日为进出小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办理出入证,严防死守和宣传教育。这些凡人小事,只是全国疫情防控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各级政府、社区干部、物业管理在疫情肆虐时期,贯彻中央精神,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责任和担当,是众多散文中见诸真情的优秀篇章。以上举例的是这次征文活动中的部分作品,是疫情期间“灾难文学”的优秀代表。正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疫情使《西部人文学》看到了文学的机遇,抓住了创新的机会,抓住了创作的灵感,抓住了生活的源泉,抓住了丰收的季节。《西部人文学》开展“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主题征文,本身就说明了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勇气和敏锐的视角。从广大作者的角度讲,在“新冠”肆虐的疫情面前,来自各行各业和全国各地的文学工作者,心中有党和国家,心中有组织和人民,心中有担当和使命,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使诗人诗情勃发,激发出创作情愫,汇聚成弘扬中国精神的磅礴力量。

文学创作要发挥作品的文学功能,增强舆论引导,发挥针对性和有效性,突出主题。在疫情防控期间,文学工作者“逆行”而上,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面对灾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贯彻中央精神,关注疫情一线,注重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作品,弘扬英雄业绩,传播正能量,汇聚影响力,彰显公信力,展示才华,服务人民。著名生物医学家、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向人类敲响警钟,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智慧地生存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人民一定会坚定信念,众志成城,取得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利。《西部人文学》也将和全国文学文艺媒体一道,贯彻中央精神,发挥区位优势,展示文学水准,彰显文化魅力,注重创新创意,打赢疫情阻击战,为促进文学繁荣、国家振兴、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总是与各种既定的标签捆绑,使得“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深陷于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泥沼中,逐渐显现出被尘封的“孤岛”感。实际上,“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虽然表现形式特殊,但它们均是根植中国文化的土壤,描绘中国人物、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砥砺奋进精神的作品。此外,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十七年”的中国科幻更加全面且精准地预言了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

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这种对科技,尤其是对科技发明的向往之情极其强烈。当然,这种向往并没有走向魔法化或者像古典技术幻想般缺乏自治逻辑,转而是通过构建科技乌托邦的形式,去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的最终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吃饱穿暖、城市化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充满科技化元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风靡全国,这部小说实质上是一部游历性的发明创造小说,多年过去,读者仍对其中小汽车大小的西瓜和足球大的番茄记忆犹新。对巨大、巨量农产品的描述其实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中已有体现。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徘徊,吃饱穿暖成为了最为迫切的诉求,因此借助科技力量达成未来粮油不愁的美好生活是当时科幻小小说白胖胖的内容之一。1956年,迟叔昌发表科幻作品《割掉鼻子的大象》,故事讲述“我”受邀到位于戈壁的国营农场进行丰收新闻的采访,却意外地遇见了人们在追逐观看一群没有鼻子的白白胖胖的大象,“我”带着各种疑问最终见到了国营农场的老同学李文建,他为我解释这是国营农场的新型农产品“白猪72号”,并带我参观了国营农场的其他奇迹,还让我品尝了新品种猪肉做成的美味菜肴。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部分读者甚至认为迟叔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大跃进时期“肥猪赛大象”的状况。尽管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违背了生产规律,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期待是对丰饶物质生活的向往。除《割掉鼻子的大象》外,“十七年”时期类似的小说还有鲁克在1960年发表的小说《海底鱼厂》、王国忠在1961年发表的《海洋渔场》等作品。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除养殖业外,种植业也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小说中得到了想象